

江蘇文史資料第二十九輯

汪偽政權內幕

江蘇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前 言

汪精卫国民政府，是距我们今天最近，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个伪政权。它于1940年3月30日成立，至1945年8月随着日军的投降而覆灭。这个短命的傀儡政权，是日军侵华政策的产物，它只能在日军的卵翼下生存和发展，完全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和工具。

《汪伪政权内幕》，以当事人的亲历、亲闻、亲见为主要内容，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揭露了汪伪政权从建立到灭亡，充当日军镇压中国人民的鹰犬，进行出卖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罪恶勾当，以及内部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事例。文章的作者，既有伪政权上层人物，也有中下级官员，他们中，有的死心塌地充当汉奸，与日本侵略者一道，被奋起的中国人民的民族战争所埋葬；有的中途警醒，弃暗投明；有的则是中共地下党派遣打入伪政权的秘密工作者。此外，我们也适当收入了部份国内学者撰写的文章。

我们编辑这部资料，旨在使广大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中国历史上的这个傀儡政权——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它的畸形结构，它的罪恶活动，以及它与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为敌，逆历史潮流而动必然走向灭亡的客观规律；同时，也可以为国内外史学界奉献一点真实可信的参考材料，为青少年提供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

本专辑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上海市政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公安厅、南京市公安局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蔡德金、黄美真同志的指教，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并希望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本书编辑刘晓宁，审阅吴志明。

目 录

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始末 蔡德金(1)

汪精卫叛国投敌筹组伪政权(1) 伪国民政府的成立及其主要罪恶活动(10) 汪伪政权的灭亡(20)

附: 伪国民政府组织系统及重要官员一览表

(1940年3月30日).....(25)

汪伪、伪满“建交”记 周逸峰(26)

维新政府外交部结束 汪伪外交部取而代之(26) “建交”前奏——两次“外事”往来(27) 汪伪和伪满通使设领(31) 同床异梦的两个傀儡政权(34)

汪伪政府的军事组织和伪军 苏时文(39)

伪军的起源和建立(39) 汪精卫积极拼凑军事班底(42) 末日来临前的三部曲: 内部争斗—汪蒋合流—积极反共(52)

汪伪军事委员会报导室内幕 杨蔚云(58)

报导室的成立(58) 频繁的情报交换(60) 日军卵翼下的传声筒(67) 日军对我的重点“关照”(70) 国民党与日伪的“谋和”活动(73) 尾声(79)

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苏北行营 许廷孙(81)

争权夺势的产物——“苏北行营”出笼(81) 掌牧民——

“行营”的核心人物(84) “苏北行营”面面观(87) 日本太上皇(93) “苏北行营”的兵力和“党务”(96) 李士群争斗的胜利——“苏北行营”撤销(98)

伪政权后期军事情况一瞥张 恒(101)

汪精卫赴日前的布置(101) 伪军事委员会内部的明争暗斗(102) 陆海空军同袍社(106) 点验和扩编各绥署所辖部队(108) 汪精卫死后的伪政权(112)

我了解的汪伪中央航校顾 青(115)

初建军校时的风波(115) 航校的生活和训练(117) 震动伪朝廷的警卫营起义(118) 航校更名为中央空军教导总队(121) 探求新的出路(122) 周致和与黄哲夫(124) 酝酿新的行动(127) “八二〇”起义壮举(129)

特工头子李士群姜颂平(132)

背叛革命的前后(132) 勾结日谍川岛芳子(133) 丁、李倾轧——李士群就任特工总部主任(135) 野心勃勃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势力的膨胀(138) 招降国民党特务骨干(140) 罪恶的“清乡”活动(145) 李士群的建军梦想(151) 李士群之死(154)

汪伪特工总部南京区始末时 闻(159)

南京区的出笼(159) 组织沿革和人事变动(162) 南京区的基层区站及外围组织(169) 日军在南京的特务组织(174) 南京区的主要活动(176)

我在汪伪特工部门的经历徐振武(186)

参加汪伪中央警官训练班受训(186) 伪警政部政治警察署(188) 政治警卫总署的成立(192) 汪伪“内政部”

的烟毒查缉处(195)

我知道的日本特务组织——梅机关 ……姜颂平(197)

李士群谋夺伪江苏省长的经过 ……蒋光宇(201)

李士群谋夺伪江苏省长前日寇统治下的苏南地区(201)

汪精卫派李士群在江苏省进行“清乡”剿共(204) 李士群与绅商集团结成“倒高同盟”(206) 横林事件——高冠吾被迫辞职 李士群上台(210)

日伪在苏中的“清乡” ……姜颂平 陈自求(216)

两个并存的机构——苏北“清乡”公署和“朱公馆”(216)
勾心斗角中成立的“清乡”武装(219) “清乡”的罪恶活动(226) 中统与汪伪的勾结(230) 丁维藩——垮台前登场的人物(232)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始末 ……姚盛祥 沈家振(236)

中央储备银行的成立(236) 强行推行“中储券”(240)
排斥“法币”改组国民政府银行 建立以日元为中心的金融体制(247) 为日军支付军费的工具(254) 中储行垮台前(261)

汪精卫新国民运动内幕 ……戴英夫(264)

背景(264) 出笼(266) 日伪对运动的“促进”(268)
青少年团——活动的重点(270) “除三害”——充当汉奸政权的工具(273)

江苏沦陷时期日伪的毒化政策 ……孙云年(276)

敌伪勾结 公开贩毒(276) 庞大严密的组织(278) 改变行政管辖(279) 大量输入南洋烟土(282) 烟土贩卖

的官私合流(282) 宣传禁烟 装模作样(283) 局长会议
花天酒地(285) 勾心斗角 人事更替(286) 鸦片配
给(287)

1943年“粮食贪污案”真相……计锡林 赵天一(289)
大肆贪污 中饱私囊(289) 无锡封粮(291) 东窗事发
(292) 最后的结局(294)

日本投降时的南京

——陈公博自述……(296)

周佛海身边的军统少将——周镐……郭必强(304)

初涉军统组织(304) 奉戴笠之命重建军统南京站(305)

西流湾8号——周公馆失火之谜(306) 周佛海身边的

军统少将(308) 接管日伪政权的三天(310) 身陷囹圄

(316) 走上光明之路(318)

汪伪巨奸陈公博的末日……孙云年(320)

巨奸起解 押送苏州(320) 公审陈公博(323) 大汉奸

的末日(328)

周佛海受审旁听记……赵毓麟(333)

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始末

蔡德金

汪精卫叛国投敌筹组伪政权

1. 投敌前的秘密活动

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营垒内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反共集团，反对国共合作，反对抗战，主张对日妥协投降。南京失陷前，他们就在南京纠集军政要员中的一小撮亲日反共分子、亡国论者，结成了一个“低调俱乐部”的秘密组织，并以周佛海在西流湾8号的私宅为据点，暗中进行降日活动。南京失守后，随着国民政府的西迁，汪精卫、周佛海又将他们的组织和活动进一步扩大，在汉口成立了一个公开的所谓文化团体“艺术研究会”，并在香港、长沙、广州、成都、重庆、西安等地设立分会，其主要负责人就是“低调俱乐部”的核心人物周佛海和陶希圣。艺术研究会的宗旨，就是收买、拉拢文化界的各种反对抗战和反对国共合作的知识分子，组成联合战线，通过出版刊物和丛书，进行反对共产党及其发起、组织和领导的抗日宣传活动，为国民党降日反共制造舆论，使国民政府对日“可战可和”。与此同时，他们还利用蒋介石企图对日妥协的心理，暗中与日寇勾结。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了实现灭亡中国的目

的，对国民党交替采用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的两手策略。1938年1月，日本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对蒋介石的诱降失败后，16日，首相近卫文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此后，日寇一方面加强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先后发动了攻占徐州、汉口和广州的作战，妄图通过大量消灭国民党军事力量，占领华北、华中和华南主要城市和交通线，迫使蒋介石投降；另一方面又在其占领的地区收罗各种民族败类、残渣余孽，成立汉奸傀儡伪政权，作为统治中国的代理人。

日军扶持成立了北平“临时政府”和南京“维新政府”，但都是由一些老牌的亲日分子、北洋军阀余孽和国民党失意政客组成，这些人早已声名狼藉，在政治上发生不了什么影响。于是，日本帝国主义改变了对国民党诱降策略，在坚持“蒋介石必须下野”的方针下，决定分化和瓦解国民党营垒，拉拢收买亲日、反蒋、反共分子，与已成立的伪政权合作，组成中国新的中央政府，并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汪精卫时任国民党副总裁、中政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等重要职务，其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且有一定影响。因此，日寇企图利用汪精卫的地位与影响，使其取蒋地位而代之，以实现与日本的“和平”。

在日寇进一步扩大侵略，国民党军队的大溃散，广大国土相继沦陷的形势下，汪精卫集团害怕极了。他们声称抗战继续下去，将使“自己灭亡”。1938年6月，汪精卫卖国集团就与日本开始了秘密谈判。同年11月3日，日本政府根据日、汪之间谈判的初步结果，由首相近卫发表第二次对华政策声明，宣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们并不予以拒绝。”这是以蒋介石“下野”，来代替“不以国民党政府为对手”，公开表示扶持和号召汪精卫对日投降。

汪精卫是一个野心勃勃、领袖欲极强、政治上反复无常的政客。长期以来，他为夺得国民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与蒋介石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斗，日本扶汪反蒋的方针，正中其下怀。于是，汪精卫及其一伙便与日寇进一步勾结，并于同年11月20日，与日本秘密签订《上海协议》。汪接受了日本灭华的全部条件，日本则支持汪精卫成立“新中国中央政府”。

汪精卫深知要成立以他为首的“新中央政府”，这是蒋介石不能容许的，因此只能在蒋介石统治势力以外的地区才有可能。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经过精心策划，于同年12月18日，汪精卫偕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他的老婆陈璧君，国民党侨务委员会教育长陈春圃，国民党中央委员、亲信秘书曾仲鸣等，潜离重庆到达昆明，与先期抵昆等候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宣传部代理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周佛海及陶希圣等会合，于19日一同逃往越南河内。2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陈公博，也奉汪命由成都经昆明逃到河内。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声明响应日本首相22日发表的对华三原则，公开宣布卖国降日。从此，汪精卫集团便正式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成为日寇的傀儡和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卖国集团。

汪精卫原计划在西南地区依靠龙云、刘文辉、邓龙光、张发奎等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成立反蒋、反共的“中央政府”。龙云等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中央政府之间矛盾很深，特别是国民政府西迁之后，蒋介石的势力逐渐深入云南，龙云等人对此极为恐惧和不满。而汪精卫在与日本勾结的过程中，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曾派陈璧君往广东、广西、云南以及河内、香港等地活动，利用地方势力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进行拉拢。汪精卫潜回昆明后，也把他的计划向龙云交了底。但是，汪精卫发表了《艳电》，全国一片声讨，迫使龙云等人不敢支持和响应汪精卫的声明。汪只得

改变预定计划，回到日本占领的南京，依靠日军刺刀的保护，建立汉奸伪政权。

汪精卫在河内期间和到上海后，曾多次向日本送交了关于成立中央政府的计划，并要求去东京了解日本对他成立政府支持的程度。日本政府经过研究后，同意了汪精卫的要求。5月31日，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陈耀祖、董道宁、周隆庠等，在日本特务影佐祯昭、犬养健的陪同下，由上海到了东京。

2. 汪精卫访日——卖国活动公开化

6月10日至15日，汪精卫分别和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陆相板垣征四郎、海相米内光政、藏相石渡庄太郎、外相有田八郎和近卫文磨举行了会谈。汪精卫一再表示愿意接受日本提出的要求，“共同防共和中日提携，努力建设东亚新秩序”；但他要求日本允许他采用“国民党”的名义和以“三民主义”为口号，来从事成立中央政府的活动。日本各大臣表示一致支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并陈述了日本政府规定的原则与方法。

6月18日，汪精卫结束了在日本的活动回国，于7月9日在上海发表广播讲话，开始公开进行卖国降日活动；10日，又在上海出版机关报《中华日报》；8月28日，在上海召开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通过了：一、党务整理案，宣布1939年1月1日以后，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一切决议、命令全部失效；解散国民党中央及其地方机关，静待改组；修正国民党总章，废除总裁制，实行主席制，主席代行总理职权，推汪精卫为主席。二、修正国民党政纲，废除一党专政，并授权汪精卫与党外人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准备“还都”南京。会议还通过“以反共为基本政策”，根本调整中日关系，迅速恢复国交，以及迅速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等案。经过这次会议，汪精卫就以所

谓合法的“国民党主席”的资格负责筹组伪政权了。

1939年11月，日本通过在上海的特务机关——梅机关（日本为专门进行汪精卫工作而成立的一个特务机关，因机关长是影佐祯昭，也称影佐机关，其成员来自陆海军及政府等部门），就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与汪精卫开始进行秘密谈判。谈判从11月1日开始，到12月30日最后签字，长达两个月。其中正式会谈只有七次，主要是一系列的非正式的私人会谈。日方参加会谈的以影佐为首，汪方参加会谈的有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周隆庠、林柏生。

《要纲》的草案是日本兴亚院提出的，它不仅包括了《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的全部内容，而且进一步增加了许多更加详细的要求。按照《要纲》的规定，从天上到地下，从沿海到边疆，从陆地到海洋的中国全部主权，全要受日本的控制。按照日本的要求，《要纲》的秘密事项是永远不公开的，就是对“临时”和“维新”两汉奸政权的头子，也要予以保密。

在谈判过程中，汪精卫集团对条款中的某些规定，诸如日本对汪伪政权的各级机构派遣各种名义的顾问和职员问题、日本的驻兵地区及限期问题、经济问题、华北伪政权的地位和各种特殊权利、各个特殊区域的问题，也作了一些讨价还价，其目的是想使他的中央政权能多少有一些权力，减少一些汉奸傀儡政权的形象，以便于欺骗人民，但都被日本一一加以拒绝。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在这张卖国契约上签了字。

关于“新中央政府”的组成人员和政治形式问题，日本方面规定参加政府的不仅仅是汪精卫集团，还必须包括“临时”、“维新”两政权成员，以及吴佩孚和“改组后的重庆政府”。

关于“临时”和“维新”两伪政权的处理问题，汪精卫最早向日本提出，在汪政权成立时上述政权必须解散，以便使他的政权有

一个地域和一些权力，但是被日本拒绝了。日本认为，两政权是“既成事实”，即日本已经取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权力，汪精卫必须继承，所签订的条约必须承认，即取消名义，保留实质。“临时”政府的名义在取消后，要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只与“中央”政府保持表面上的统一。这就是日本所说的“分治合作原则”。

汪精卫为实现与各伪政权的合作，从日本回国以后奔走于北平、上海、南京、广州各地，与各汉奸头子及其支持者——各地日本派遣军进行谈判，讨价还价。汪到北平时，准备与吴佩孚谈判，但因双方对于未来政权中的权力分配问题，事先未能妥协等原因，而取消了会谈。同年12月，吴佩孚死去，汪与王克敏、梁鸿志等人的“合作”问题，也因为在分赃上不能妥协，而一直没有进展。当时梁鸿志提出：“中央政府”要以维新政府为基础进行充实和改组，并由他担任行政院长，这当然不能为汪所接受。由于日本的干预，汪、王、梁才于9月19日和20日，在南京召开了三方参加的第一次分赃会议。这次会议只是互相表示“支持”与合作，而具体权力分配和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的问题，彼此未能妥协，只决定由三方面再一次召开会议规定。

1940年1月，也就是在汪日密约刚刚签订，汪、王、梁第二次分赃会议的“青岛会谈”将要举行之时，汪精卫集团内部却爆发了一场内哄。1月3日，高宗武、陶希圣两人由上海秘密乘船往香港，脱离了汪精卫卖国集团，并于1月2日在《大公报》上公开了汪与日本秘密签订的卖国条约——《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内容。

高宗武是汪精卫与日本勾结的关键人物，陶希圣是汪精卫“和平运动”的智囊。高、陶二人的出走，一是由于汪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矛盾的激化。汪精卫与日本的勾结，都是通过高宗武进行的，高本想在未来政权中担任外交部长，但这个伪职，汪精卫却

给了他的连襟褚民谊。陶希圣虽然担任了伪国民党宣传部长，但实权却掌握在汪的亲信、次长林柏生手里，这种情况使高、陶都极为不满。二是由于他们知道要为签订汪日密约承担罪责的。陶希圣是参加汪日谈判的成员之一，他几次向汪表示不愿参加谈判，汪精卫在给陶希圣的两次回信中，一再劝陶继续参加会议，协助周佛海结束会谈，对日本的条件有不满的地方，可以依“同志式”的态度，与日本力争等等，陶希圣后来也竭力表白这一点。三是由于国民党的策反工作。高、陶前往香港时，一切都是由杜月笙负责安排。后来，蒋介石送高去了美国，陶希圣成了蒋介石的亲信侍从室人员。

高、陶的出走和卖国密约的公布，给了汪精卫集团一个重大打击，汪精卫、周佛海、陈春圃等先后为此发表声明和谈话，妄图否认。周佛海甚至恨得“咬牙切齿”，在日记中写道：“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也。”

1940年1月23日，汪、王、梁第二次会谈在青岛举行。参加会议的除上述三方人员外，还有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李守信。日本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梅机关的影佐祯昭及北平和南京各地日军特务机关长等，都作为后台老板，也到了青岛。会议的议程、会议要讨论的《关于建立中央政府的大纲》、《政府机构一览表》、《中央政治会议条例》、《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等，都是由梅机关事先拟好决定的。23日，首先由周佛海代表汪精卫与李守信会谈。由于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是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的，所以双方表示了今后相互予以“支持”及“协助”之后，会谈就算成功了。汪、王、梁三方的会谈从24日开始，由于有其主子们在后台督导，一切方案“顺利”通过，并按计划于25日“胜利”结束。会议决定将于3月初在南京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完成“组府”的最后工作。

2月12日，汪精卫指派周佛海在上海召集所谓“各合法政党领袖及社会上负重望人士”举行会谈。参加会谈的有国家社会党的褚青来，中国青年党的赵毓松，以及所谓社会知名人士赵尊岳、岑德广、杨毓琦、赵正平等。周佛海向他们报告了青岛会谈的结果，邀请他们参加“中央政治会议”，并获得了一致的“支持”与“赞同”。

预定于3月初举行的伪中央政治会议，由于日本的决定，改于3月20日至22日在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伪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等十人，伪临时政府的王克敏等五人，伪维新政府的梁鸿志等五人，国家社会党的褚青来和李祖虞，中国青年党的赵毓松和张英华，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卓特巴扎布和陈玉铭，以及赵正平、杨毓琦、岑德广和赵尊岳，共计三十人。

这次会议通过了伪中央政府的名称、旗帜、首都、组织机构、政纲和成立时间，通过并公布了中央各机构的人选。至此，汪精卫筹备成立伪政权的工作基本结束，只等主子一声令下，就可粉墨登场了。

3. 成立伪政权——讨价还价的产物

关于汪伪政权成立的时间，不能由汪精卫作主，而必须由日本根据形势的发展来决定。汪在东京会谈时，汪虽然几次提出了时间表，周佛海还于1939年10月中旬去日本催促赶快成立，但都未得日本允许。1940年1月，日本方面不好再拖，但仍迟迟不公布时间表。后来日方同意“中央政治会议”于20日在南京举行，30日“还都”南京，但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犬养健还通知周佛海，要求将“组府延至4月15日”。周佛海一听此话，急得不得了，立即去找影佐，表示如果成立时间“延至4月15日，此间必崩溃，

故最迟不能超过3月31日。”就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同意了汪政权的成立。

汪伪傀儡政权之所以如此难产，是由于日本在扶植汪精卫筹组伪政权的同时，也在千方百计地开辟诱降蒋介石渠道。

首先就是利用姜豪去重庆实施诱降。姜豪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1939年1月中旬奉命去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受训，5月初秘密返回上海，9日在公共租界被日本宪兵绑架。在关押期间，日本小野寺机关(特务机关)长小野寺信、日本特务吉田东祐(不久被任命为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特派员)要姜豪介绍重庆方面的国民党负责人，交换关于“和谈”的意见。小野说：日本的元老重臣和资本家，都希望早一点结束中国战争，就是军人少壮派中也有一部分赞成适可而止。因为不论日本今后南进或北进，把中国问题先结束，对日本总是有利的。而且他认为，与已经离开中国政府的汪精卫去谈判和平，根本不可能。

姜豪在日本人的指示下，由上海到了香港，经过与国民党港澳党部负责人吴铁城和上海市党部负责人吴开先及杜月笙等的联系后，于6月底到了重庆，向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报告了日本人的希望。蒋介石获知此事后，通过戴笠让姜返香港，以“个人身份”与吉田谈判。由于日本提出的条件是要蒋介石下野，因此，12月份，蒋便命令中止了这次谈判。

此次谈判失败后不久，日本又通过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在香港开始谈判(日本称此次谈判为“桐工作”)。

1940年3月，犬养毅要周佛海再次推迟汪政权成立日期，就是由于香港谈判有了某些进展。

日本推迟汪政权成立时间，当然也还有其他原因。比如，日本希望能诱使国民党军政要人参加汪政权，以便成为“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汪精卫在成立伪政权的活动中，与日本争论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国旗”的问题。汪精卫以“正统”国民党相标榜，声称他的政府是“还都”南京，而不是重新建立。他要求日本同意他使用国民党的旗帜，以便于欺骗人民。日本同意了汪的要求，但提出必须在其旗帜上另附标志，即加上一块三角形的黄色布片，上面还要写上“和平、反共”的字样。汪等认为这样不伦不类的做法不利于欺骗人民，一再要求日本允许取消黄色布片，却被日本拒绝了。汪无可奈何，只好同意。但他们也不甘心，在“还都”典礼的当天，汪精卫集团曾在南京伪国民党党部的楼顶上挂上了一面没有黄布片的旗帜，日军竟以鸣枪相威胁，迫使汉奸们急忙将旗帜取下来。直到1943年1月9日，日本要求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后，旗上的黄布片才最后去掉。

伪国民政府的成立及其主要罪恶活动

1. 汪精卫卖国集团粉墨登场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卖国集团在南京演出了一场傀儡登场的丑剧，宣布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是日，汪精卫及各院、部、会汉奸头子宣誓就职，并发布宣言和政纲。伪维新和临时政府宣布解散，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也于同日宣布成立。

伪国民政府行政机构依照国民政府行政机构组成，设有行政、立法、司法、监察和考试五院及军事委员会。为了标榜实行“民主政治”，取消国民党的一党独裁，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除伪党中央执、监委员外，并吸收“各党各派”参加。早在汪精卫召开伪国民党六次代表大会时，就提出召开国民大会，公布“制定宪法，结束训政，开始宪政”。汪伪政权成立后不久，便宣布成立“宪政实施委员会”，并定于1941年1月1日召开“国民大会”。但